

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 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论文集》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
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 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41 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4190·014 定价：0.86元

内部发行

编者的话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同志主持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性的《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同志，写了论文或调查报告。现将这些论文选编成册，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社会主义社会，至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不但还会产生从事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等活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还会产生贪污盗窃分子、高利贷者和其它各种经济犯罪分子。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一概念所能全部概括得了的。为了准确地反映上述全部经济事实，我们认为采用“新的剥削分子”这个概念比较恰当，并因此把这本书定名为《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共选编二十七篇文章。我们在选编时，根据党的百家争鸣的精神，观点不求一致；只要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或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就尽量选入；在编辑过程中，除了作些文字加工和材料删节外，一般未作改动。

文章基本上是按照逻辑顺序排列的。综合论述放在前面，专题论述放在后面。论述同一个问题的文章，则按观点排列。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目前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仅仅是个开始，本论文集中的一些提法和论点是否准确，还需要通过实践作进一步的探讨。

这本论文集是在许涤新同志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青松等同志编辑的。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辑工作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几个问题	方民生(1)
坚决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长期作战	张文香(13)
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探讨	金立琪 钱 英(30)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其特点	顾宝孚(38)
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 直接原因	周积智 周崇光(53)
试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张来仪 刘照钧 邓子基(65)
关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如何产生的问题	宋则行 章宗炎(73)
从山东省若干实际材料初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 产生问题	陈 远(88)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经济根源	肖功达(104)
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分子的重要原因	刘时平(127)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和条件问题初探	林青松(136)
试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主要途径和条件	骆焉名(153)
从阶级斗争的现实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客观 条件	林祥榕(167)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与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 关系	钟国奖(178)

关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问题	经 兵(190)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对商品货币的利用问题	王洪德(209)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缝隙	卢希悦(215)
资本主义活动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漏洞	朱彤书 桂世勋(229)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	唐秋生(247)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分子的终极原因	刘必成(255)
谈谈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准问题	黄守勇(269)
试论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准	陈本善(280)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划分标准问题	郭应秋 蔡江永(290)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特点	纪宁宣(300)
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及活动规律	肖九如 幸海华(307)
从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和消亡看社会主义 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	张 萍 王忠好(322)
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看改革经济管理的必要性	洪韵珊 胡秀坤 李必成(335)

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 几个问题

方 民 生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被“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一个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对“四人帮”鼓吹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或土壤的谬论进行了批判，搞清了许多问题。但是，现实生活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再前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仍然有资本主义活动存在，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问题，作出符合社会实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找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途径，有效地同资产阶级残余分子作斗争。

一、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划分标准

阶级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划分阶级只能以它们的经济地位为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无论是在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我们都是根据这条标准来划分社会各阶级的。今天，我们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也只能根据这个标准，看他是否以剥削为生，也就是说，看他的生活来源是否主要依靠剥削得来的，从一些地区结合批判“四人帮”，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打击资本主义的

猖狂进攻的“一批双打”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材料看，有些人通过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开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运输队、地下包工队、地下钱庄，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侵吞社会财富，成了暴发户。他们剥削人民的血汗，过着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有的人虽然从事剥削活动的时间不长，但牟取的暴利已足够维持他们好几年的生活。象这样一些人，都应属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有些同志认为，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既要从经济上分析，又要看政治态度，要用经济和政治两个标准来衡量。这种看法主要是没有分清下面三个问题：

（一）划分阶级和分辨敌我友，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件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显然，这里讲的是分辨敌我友的问题，而不是说划分阶级的标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大量侵吞社会财富，剥削别人劳动的人，总是敌视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本身就是错误的。但不能说，凡是剥削阶级在任何时期，都是我们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从它的经济地位来说，它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它具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所以，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说明划分阶级和分辨敌我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划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第三页。

阶级只能根据它的经济地位，而分辨敌我友还要根据它在不同时期对革命所持的态度。

(二) 要把资产阶级分子和它的政治代表区别开来。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有它特定的经济内容，一般是指那些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为生的人。而它的政治代表则不一定个个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反映了剥削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就是这样的政治代表。其中，象王洪文、翁森鹤之流，本身就是新生产资产阶级分子，是“双皮老虎”。

(三) 要把划分阶级的标准和政治上对剥削阶级分子处理的政策区别开来。划阶级，定成份，只能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对剥削阶级中某些人的处理，则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比如，在土改时，地主阶级中有恶霸地主、开明地主和一般地主之分，处理时要有所区别，但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今天，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处理，不仅要根据他们本人的态度，而且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要有所区别。这样做，是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这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两码事。

其实，用“两个标准”来划分阶级，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骗局。他们把用政治标准来划分阶级，歪曲成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实践上颠倒了敌我关系，搞乱了阶级阵线。他们就是以所谓政治标准为根据，把反对他们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革命干部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为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这个骗局，必须戳穿。

综上所述，划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只能根据其经济标准，

而不能有别的标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概念有特定的含义，不能滥用。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应根据不同情况，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名，不能笼统称其为新资产阶级分子。

二、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

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考察一个阶级之所以能存在，并不断地出现新的分子，只能从社会生产中去寻找。有什么样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也只能从社会生产中去寻找。恩格斯说，目前之所以还有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①只有到了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任何个人需要的满足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因此，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两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个人需要的满足不能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每个劳动者只能根据为社会提供劳动量的多寡，领取相等的产品。谁要是超越了这个限度，贪得无厌，想成为暴发户，就必然要侵吞社会财富，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损害他人的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根源。

从调查材料看来，生产力水平低就会出现如下情况：

（一）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并存的局面，因而就有商品生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第二七八页。

产和货币交换。虽然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商品与货币的存在，无论是未改造好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具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都可以利用商品与货币这种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特别是在生产力遭到破坏、物资供应紧张的时候，资本主义势力就趁机活动，抬高物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这就有可能使少数人手中掌握大量货币。

（二）在生产力还不发展，特别是在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就业人员就不能不受限制，使社会上存在部分待业人口。尽管从理论上说，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人的劳动力没有同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些待业人口要生活，就得找工作。因而，只要有工可做，不管是什么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包工队，就会有人去。这样，劳动力岂不成了商品，而且不少人已经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剥削的对象。有的人，还趁安排劳动力的机会，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员的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还不能消除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现在，社员的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已经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小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和必要补充。它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实践也证明没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从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中产生出来的。但必须看到，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仍然带有小商品经济的性质。所以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在一些人身上还顽强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

某些人身上还很严重。那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就有可能蜕变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四) 生产力未充分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就不高，又加上小生产的习惯具有天然的分散离心的倾向，在很短时间里，不可能做到列宁所说的那样，由劳动者直接管理企业，还只能通过他们的代表——国家来管理。这样，在人权、物权、财权方面，都有可能被少数人用来牟取私利，从事资本主义活动。

解放以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候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就猖獗；哪个地区的生产水平低、集体经济不巩固，那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势力就特别猖狂；哪个部门的生产遭受的破坏最严重，那个部门的问题就越多；哪种产品最缺乏，最供不应求，那种商品的投机倒把活动就最严重。拿浙江省温州地区来说，资本主义势力最猖獗的是两次，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次是“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生产都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紧张，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期间，工农业生产倒退十几年，企业亏损连年增加吃饭靠外地支援，用钱靠国家贷款，国民经济已临崩溃的边缘。象以渔业为主的洞头县，一九七六年的水产品总产量只有一九五七年的八分之一，出现了许多大队和企业向私人借高利贷的怪现象。可见，温州地区的资本主义势力特别猖獗决非偶然。

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生产相对不足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因。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才不会出现，资产阶级残余才能被消灭。当然，剥削阶级是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行消失的，还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反复较量 and 斗争，无产阶级才能

取得最终的胜利。

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也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残余并没有消灭，一些老资产阶级分子和阶级敌人还在活动，据温州地区一九五九年打击投机活动的材料，从事违法活动中的人中，地富反坏分子、奸商和其它社会渣滓占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七七年清查出来的投机倒把大案的作案人中，地富反坏分子，劳改、劳教释放犯，资本家仍占百分之五点五。这伙人，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在生产领域里，一直存在着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建筑工程队。一九六〇年，温州市揭露出来的地下工厂企业就有几十个。最近揭露出来的就更多了。在流通领域里，套购国家统购物资，倒卖票证，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的资本主义活动一直存在，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一时猖獗，一时隐蔽而已。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是从这些资本主义活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缺陷，这也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在生产、流通和分配方面，都还有不少缺陷。资本主义势力就会利用这些缺陷钻空子。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就有可能同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机关中某些人勾结起来，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从中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

在管理制度方面，我们还不善于用经济的管理经济。企业经营管理好坏，还没有同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不管企业是盈是亏，是否完成计划，工人照样领工资，

厂长照样当厂长，不讲资金利用率，不讲设备利用率，不讲全员劳动生产率。有的企业甚至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因此，资本主义势力就有空子可钻。

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一部分物资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有的企业生产任务很重，而给的原材料又不足，计划不能平衡；许多集体企业的原材料，要自找门路，自己解决；特别是近年来，农村社队企业和城镇街道企业大量增加，其中大多数还没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中。这样，在供、产、销的各个环节，资本主义势力都有空子可钻。

在民主生活方面，许多企业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按理来说，企业领导人是代表国家和集体来管理企业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利益的。但是，在有些企业里，民主生活很不健全，甚至还出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事件。在这样一些单位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少数人就可能利用这种特权牟取私利，发展资本主义。象王洪文、翁森鹤及其它“四人帮”帮派骨干控制的地方就是这样。

这些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这些缺陷会不断地被克服，不完善的地方会逐步完善起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过程中，修正主义路线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是否象有的同志说的那样，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呢？不是的。它只能是起着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温州地区就是个铁证。林彪、“四人帮”及其

代理人，直接插手温州，把党搞乱了，把各级党组织搞瘫痪了。由于失去了党的领导，一切坏东西都出来了。列宁曾经指出，在混乱状态中，旧社会的各种坏分子，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会乘虚而入。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支持和庇护下，资本主义恶性膨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成批的产生出来了，给温州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能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原因和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泛滥起来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不能等同起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即使路线正确，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是要产生出来的，不过数量比较少，一出现就会受到打击。相反地，在错误路线控制下，资本主义势力会猖獗一时，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比在正常情况下更多一些，更快一些。马克思说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只是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缩短了转变的时间，并不能创造一种生产方式。这个原理也适用于我们分析反动政治路线和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关系。反动政治路线正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出世的“助产婆”。但助产婆毕竟是助产婆，而不是“产妇”，不能把反动政治路线说成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在社会主义社会，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会经常出现，又不断地被消灭，总的趋势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越来越少，他们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资本主义势力越来越弱，直至最后被消灭。不管会迁到什么曲折，这个客观规律是改变不了的。

三、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特性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家一样，都具有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逐利润。但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不同于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特点。只有剖析了这些特点，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反动本质，更有效地同它作斗争。

大量典型案例证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特点是：

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正处在被消灭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一出世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因此，它是资产阶级中最顽固最反动的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能起破坏作用。就以一度被翁森鹤控制的杭州某工厂来说，仅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损失竟达五千多万元。这说明，在分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危害性时，不仅要看它牟取多少暴利，而且要充分估计它的破坏作用。

从它的发迹过程来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都是从侵吞社会主义财富开始的，是暴发户。资本家一般都有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转化为资本。而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五六页。